

近代史研究

3

IN DAI SHI YAN JIU 1982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目 录 (总第13期)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瞿秋白 (1)
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张江明 (6)
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	徐义君 (31)
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	李明三 (49)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红枪会.....	罗宝轩 (66)
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的丰碑.....	李安葆 (77)
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	吴根樑 (92)
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	邵云端 李文荣 (114)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郭毅生 (125)
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	〔美〕汪荣祖 (143)
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	吴桂龙 (161)
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	邱 捷 (183)
从沈家本的奏议和修律看他的法律思想.....	李光灿 (201)
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 发展的作用.....	林文照 (216)
访英简记.....	丁名楠 杨诗浩 (234)
外国和台湾的“红枪会”研究.....	申仲铭 (256)
洪秀全“斩邪留正”概念考释.....	沈茂骏 (259)

读史札记

一九八一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 (中文部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263)

1982年7月出版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瞿 秋 白

一、北京屠杀后，反动潮流随英日吴张之战胜而日益高涨；京津鲁奉军的蹂躏，国民军之困守南口；吴佩孚的利用红枪会夺取河南，压榨湖北人民，进窥长沙（叶开鑫）；孙传芳之利用傅筱庵，稳定上海买办阶级之统治……帝国主义的法权会议、关税会议停顿，指使颜惠庆内阁实行大卖国计划，虽未成功（现时在阁内部冲突），然而假仁假义的让步政策已经用不着了。

二、但是反动势力内部早已开始裂痕，英日之间争夺北京政权的滑稽剧开幕已久；奉系军阀之下张宗昌、杨宇霆之间的争执也很显露；直系军阀的崩溃尤其明显，孙传芳及所谓新直系的暗抗吴佩孚，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孙传芳的犹豫等待，仿佛是可注意的事：孙传芳想等吴佩孚（叶开鑫）与唐生智两败俱伤，然后自己可以渔翁得利，而且他深恐张宗昌的暗袭南京，所以现时不积极助吴攻粤，再则赣方方本仁、唐福生等对于孙传芳也是靠不住的。然而仅仅根据反动势力内部的崩溃，来决定革命策略是决不够的。有些革命党人日夜希望田维勤、叶开鑫、唐福生的倒戈，显然是一种机会主义。如今叶开鑫的反动已完全明了，田维勤又有多大作用！现时对于孙传芳的政策亦是如此！革命党人决不可犹豫等待孙传芳的“左倾”，对于孙传芳应即施以崩败其内部的攻击。

三、“五卅”以后，中国的政治愈益不是纯粹军事阴谋的时期了。“五卅”上海屠杀至“三一八”北京屠杀后，反动势力虽能暂时结合而取胜，然其内部既立即开始崩败，而民众间革命潮流之

伏流昂进，也非常猛烈，为从来所未有。“五卅”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了，北京屠杀又压迫下来，民间的回答是：“从此誓不和平请愿，到黄埔去从军罢！”所以革命战争是“五卅”以来抵货罢工示威……之直接继续。“五卅”运动中买办阶级之统治动摇，他们“自卫”的方法，是先让几步，而这些让步（连吴佩孚之反奉亦包含在内）实际就是反动进攻的准备。只有一直进攻到扑灭全国革命势力，镇压湘粤，颠覆国民政府而后止，——只有这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之唯一出路，所以吴佩孚之反对关税会议，反奉战争，继又联奉讨伐国民军，进兵攻略湖南，以覆灭广州国民政府为目的——是一贯的反革命策略。革命方面，也只有反抗北京屠杀以来的反动潮流，号召革命战争，以反守为攻为目的，猛力向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攻袭，为唯一的一贯的革命策略。因此，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

四、此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广东以外都还处于反对买办阶级的地位（Opposition）。然而，此等稚弱之中国资产阶级，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他们只顾得地位利益，只愿以妥协手段利用工农而限制买办的“王权”。他们的这种黄色的民族改良主义是革命营垒里的敌人。所以可以预料，现时足以牵制孙传芳等军阀的“自治运动”，虽暂时有几分革命作用，不久便可以为反动派如研究系等所利用，他们不过暂时不反对革命战争罢了。

况且，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自从经过三月二十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戴季陶主义的威权正甚）。虽然广东新式右派之政权，有许多资产阶级份子也不满意，然而中国稚弱的资产阶级，现在既然还留在革命营垒之中，始终需要军力来代表他。新右派还可以算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暂时他和帝国主义妥协之可能较少；他在既得相当的领袖地位之后，为求巩固此地位起见，不得不向前进取几步——北伐。因此，北京屠杀后在全国范围内之革命联合战线之中，自然还包含着民族资产阶级，甚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竟还保持着部分的领导权。于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联合战线的反抗买办阶级统治的战争。

五、小资产阶级呢？“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显然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各地小商人反对买办士绅包办的商会法团之运动，层出不穷。可是这种运动大半都还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尤其是北京屠杀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买办资产阶级还处于对抗的地位，妥协之可能还小。不过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他的阶级利益在这群众里革命潮流伏流昂进的时机，不能容许他很稳固的做国民运动的领袖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现在渴望着革命的巨潮，来拯救他们于反动高压之下。他们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虽然他们大半是消极的等待，然而这种革命需要的深切，已经迫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不得不实行革命战争，否则他所已得领导权，就会立刻丧失，或是简直完全投降买办阶级。总之，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遽。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六、农民在五卅以后的奋起：如广东农民与地主肉搏的阶级斗争，如湖北、湖南农民协会的发展，如直隶等处农民运动的发轫：如河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处，红枪会、大刀会，硬肚会、合作社等运动的爆发，——不必详说了。北京屠杀后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咀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

（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他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对于北伐的失望，是无足奇的。这种渴望或“幻想”革命战争的事实，正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罢了。

七、无产阶级呢？——自然更不用说了。他是“五卅”运动的先锋军，他开始了“五卅”的国民革命，他应当为自己阶级的经

济政治权利，而力争民族的解放；他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中略）因此，无产阶级……的职任是：“……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在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同时即应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中之于国民革命的组织……这样去和一切革命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妥协派的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八、北伐是北京屠杀后革命之反守为攻的战争。一方面，革命平民利用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内部之自相冲突崩溃，而要推翻买办阶级的独裁制，并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而从事于广义的革命战争。别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却想以北伐的大帽子，抑制平民政治势力之开展，同时却抱着发展自己的军力、以取得将来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之资格为目的，而从事于狭义的革命战争。——妄想由此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制。

所以革命平民——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之参加赞助革命战争，其倾向必然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平民是要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革命平民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于是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的呼声，便发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应当建立各地人民团体的委员会（地方的临时革命政权），以建立平民革命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至于反动政权之下的革命平民，他们从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夺回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积极斗争中，努力赞助北伐的革命战争，不妥协的猛进，当然是无可疑议的。当然亦要指出人民争取政权的目的。

九、北京屠杀后，革命的前途至此已开了第一个新阶段，革命战争之中，正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统治崩溃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以现今的形势及国际的一般关系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权之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难道可以说:现实积极的赞助并主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爆进”?

八月七日倚装改正纪录

〈史 学 情 报〉

《史学情报》是《中国历史学年鉴》的附册,可供高等院校历史系师生、中学历史教师及广大史学爱好者比较及时、全面地了解全国史学研究成果和动态。它的主要栏目有:

选自近期全国各报刊的古今中外历史文章约七十篇,每篇
摘成千字左右。

国内外历史书讯;

国内外史学动态;

国内外考古文物新发现;

建国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重大史学问题的讨论;

国内近期历史新书目;

国内各报刊历史论文索引。

《史学情报》每册约十四万字,每年三、六、九、十二月
出书,每册定价五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

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张 江 明

彭湃是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和领袖人物，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战士。他在青年时期就追求真理，较早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艰苦深入地进行农民工作，曾经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农会和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他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写下了不少关于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的论著，对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彭湃诞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到中国来，使彭湃青年时期就开始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

彭湃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九一七年夏，彭湃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他在东京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曾被日警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悲愤之余，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九月，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成立“建设者同盟”，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等。这个组织的成员很多来自农村，很重视研究农民问题，强调从事农民运动，寻求建立一个“最合理的新社会”。彭湃是“建设者同盟”的积极参加者，这对他确立从事农民运动的思想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据一位日本学者介绍：“彭湃认真参加读书小组和公社大会，努力去理解和吸取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为自己将来回国后的活动作好准备。”同盟中的活动分子，如高津正道、和田岩等，都实际从事农民运动。后来，和田岩病死，

彭湃知道后，写信给李春涛同志，甚为怀念。信中说：“和田岩君你记得吗？日本建设者同盟的中坚，我们阶级斗争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健将；闻他因到乡村去，十几日没得睡眠，回来发生胃肠病，一命呜呼。唉，真惨悲！真痛恨！唉，我的眼泪要滴下来了。”^①此外，彭湃加入“劳动者同情会”，注意接触工人群众，常帮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坡。他还加入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东京成立的“宇宙社”。同年十月，他和李春涛、杨嗣震、林孔昭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发起组织“赤心社”，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探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问题，并积极参加日本的工农群众运动，使他开始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据陈其英回忆彭湃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形容他的心情说：“觉得象处在暗房中打开了天窗，见到了阳光。”一九二一年五月初，彭湃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前，施复亮和他谈过话，他当时已经有“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的思想。^②

彭湃在一九二一年从日本回到广州不久，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在广州的海丰“要人巨公”很多，彭湃竟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不可能相信，并“因此遂不敢交纳彭湃”^③。一九二一年八月，彭湃曾在广州见过陈独秀。后来，陈炯明为了网罗人才，假装进步，指令海丰县长委任彭湃为县教育局局长。彭湃在海丰建立两个团体：一个是社会主义研究社，主要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他向工人、农民作过《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的演讲。另一个是劳动者同情会。在《缘起》中说，组织这个会，“表示同情于劳动者”，“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彭湃组织全县学生举行纪念大会，由学生高举写着“赤化”两字的红旗游行示威，却没有一个工人和农民参加，到

①③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

②《施复亮先生访问记录》。

了体育场开大会，彭湃讲了话。这件事震动了全海丰。那些地方绅士造谣说他要实行共产共妻，向陈炯明告状，因而他被撤掉教育局长职务。彭湃便和几位同志办了一个《赤心周刊》，同陈炯明主办的《陆安日报》展开论战。这时候，他回顾和检查前一段工作，发觉“自命”为代表工农群众讲话和做事，“可是背后却绝无半个工农”。要进行社会革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知识分子之中，于是，“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彭湃文集》第111页。以下凡引自《文集》的，只注明页数。）

彭湃从事农民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于信仰，“要努力去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第192页），他注重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来，结合中国的实际，尤其在农民问题上更加突出。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开始做农民运动。当时遇到的困难很大，主要是家庭和社会的强烈反对。农民对他不了解、不相信。他的家庭是海丰有名的大地主，根据彭湃堂弟彭承训的回忆，彭家“最盛时拥租一千六百担，放高利贷四百担，鱼塘三大口，开设商店数间，雇工十七、八人，还有房屋六十多间。彭湃就在家门口闹革命，成为“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家里知道他要搞农民运动，除了爱人和三兄、五弟之外，都恨他，骂他是“败家儿”，“要破家荡产”，他的大哥甚至准备杀死他；同族的人也都厌恶他；豪绅地主更是对他造谣污蔑，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彭湃在一片责骂、讥讽、诽谤、恐吓声中，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进行农民运动。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

最初，彭湃只是满腔热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穿着学生洋服，戴着白通帽，讲着文雅的话到农村中来。农民以为他是做官的，来收税。看见他，连忙躲避，或不答话。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使他很苦恼。经过反复思索，寻找原因，认识到是由于服装、说话、举止和农民不同，存在着阶级的区别。彭湃便脱掉学生装，穿上粗布衣，用群众的语言，宣传地主霸占农民的土地，靠剥削为生的道理，用阶级观点来消除“天命”思想。逐渐得到

农民的赞成,从中发现了积极分子,首先成立六个人的农会,以他们为骨干(根子),通过个别串联,思想发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把农民组织起来。到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委员会发展到五百多人,成立了赤山约农会。三个月后,又激增到十万多人,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成立海丰县总农会,选举彭湃为会长。农会的章程、传单、宣言,都是由彭湃起草的。农会成立后,在保护农民利益,对农民进行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反对地主加租保障农民的佃权;取消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或收回作农会经费;调解农民的纠纷;开办农民学校和农民药房,等等。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农会的威信更高,发展更快。一九二三年七月,成立广东省农会,选举彭湃为执行委员长。

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对社会主义和农民运动的责难,为农民运动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时,揭露地主阶级的残暴剥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病,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和必然性,这就引起地主、官僚、军阀的造谣中伤,最普遍的是什么“共产共妻”,以造成农民的误解,不敢参加农会。彭湃等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次给予批判。彭湃指出,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可以明白。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实行公妻制,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主张自由恋爱,坚决否定“公妻”。试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妓馆林立,“资本家、官僚、富豪、商人,皆公然滥遂其肉欲,此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之公妻制为何?共产主义是反对这种制度”的(第6页)。彭湃又指出,“均富均财,不过将现社会各人的私有财产,挪来平均分配而已,根本上仍是承认私有财产制度之存在。”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第5—6页)。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革命的决心,实践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冬,彭湃把家中的田契当众焚烧。据他母亲回忆。当时在龙舌埔演了数台戏,有一万多人观看,彭湃把彭家先翁手创所有田契铺约

一张一张的焚烧殆尽。消息传遍东江各地，扩大到全国。这一实际行动，打消了千百万农民的疑虑，扫除了社会上对他组织农会的各种攻击和造谣，广大农民群众公认他是“真革命”，看作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从此，农会迅速壮大，朝气蓬勃。

海丰的农会为广大农民谋福利，权力日益增大，引起地主阶级的恐慌，他们急忙成立了一个地主阶级的组织“粮业维持会”，同农会相对立，两个阶级之间展开斗争。一九二三年六月，海丰遇到特大天灾，狂风暴雨把水稻和经济作物大部分摧毁，严重失收。农会经过研究，提出减租，考虑到农民和地主双方利益，拟定减七成、交三成的方案。地主不顾农民死活，竭力反对，同陈炯明控制的县政府勾结，动用武力，解散农会，逮捕农会负责人，这就是“七五”农潮。后来，经过复杂的斗争，终于使被捕的农会负责人释放，恢复农会活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彭湃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和区委农委负责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兼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他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了第一届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培训农民运动干部。随着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日益尖锐。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彭湃经常到第一线指导农民斗争，他的足迹遍及广东各地，先后指导过广宁、花县、普宁、潮梅、汕头、曲江等地的农民斗争。

一九二五年二月至六月，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海陆丰的农民积极配合，作出重大贡献，东江农友牺牲达五百多人。彭湃两次随军到海丰，他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把原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为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委，并成立海陆丰地委，彭湃任书记。到一九二六年，海丰县已有中共党员七百多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发展到四千多人。在海丰县的八百多个农会中，大多数已建立党支部或小组。农民自卫军、赤卫队和各种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在党组织领导下，加强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更加有力地推

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彭湃主持召开第二次省农民代表大会，他也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到是年冬，全省已有七十三个县建立农会，有会员七十多万，还有数万农民自卫军。这对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七年三月，彭湃和陈延年、苏兆征等到武汉。他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农协秘书长。他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派彭汉恒回到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根据党中央决定，彭湃前往南昌参加装武起义。南昌“八一”起义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彭湃任委员兼农工委员会委员。在党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彭湃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随南昌起义部队来到广东，担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东江特委成立，由彭湃任书记。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彭湃领导下，先后在海陆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工农民主政权成立，颁布施政纲领，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烧毁田契四十七万多张，租簿五万八千多本，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工农群众欢庆胜利。在广州起义时，湃彭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湃被选为“六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十一月，调到党中央工作，任中央农委书记。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死而复生达九次，但他仍然坚贞不屈，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就义时年仅三十三岁。

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和旧时代的、旧式的农民运动根本不同。

第一，彭湃从事的农民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不用披着宗教外衣，不让“天命”、神权来干预。

历史上的海丰农民在封建王朝统治下，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迫使农民举行多次起义。例如，规模较大的有元末林子琪率领起义农民攻入县城杀死知县鲁达花；明嘉靖年间，赖元爵、蓝一清率领农民起义；明崇祯末年，薛进率领农民暴动；清咸丰四年，黄履恭率领农民起义；清光绪二十五年，洪亚重聚集农民起义，等等。他们没有先进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以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而是相信命运，由神权来支配，以宗教为外衣，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他们的斗争虽然很英勇，由于受到阶级的局限性，难免不陷于失败。彭湃比较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虽然也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时间不长，他的主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实践的。他从日本一回国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团与党的关系很密切，有时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对团员的要求很严格（对彭湃入党时间还有不同看法，一说是一九二一年，一说是一九二四年）。可以说，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方向明确，道路正确，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成绩显著。

第二，彭湃从事的农民运动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不是搞绝对平均，也不是搞改良主义。

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总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个别封建皇帝和官吏，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封建土地制度。他们提出过：“劫富济贫”、“等贵贱，均贫富”，以至“均田”、“无处不均匀”的口号，发动了千百万农民起来扫荡贪官污吏，分掉地主的财物，打击了封建王朝，但没有把解决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农民阶级一样，有着很大

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引导农民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彭湃由于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和解决农民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摆脱了平均主义思想的束缚，使农民运动走上新的阶段。彭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海丰的土地占有状况、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贫农雇农受剥削的根源，指出了农民的根本出路，把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从感性提高到理性上来，明确提出以反对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为中心，从反对地主夺佃加租，到减租减息，到没收地主土地，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在海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在彭湃领导下建立海丰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没收分配土地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由工农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确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觉悟。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由共产党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树立了光辉的旗帜。

第二，彭湃从事的农民运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不是以分得若干土地便满足，止步不前，或陷于空想。

历史上的农民运动由于受小生产者的影响，缺乏远大的眼光，认不清最终目标，提不出最先进的纲领，往往在农民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因为受了私有的封建的思想侵蚀，或者逐渐封建化，不能坚持到底；或者革命的领导权被别的阶级篡夺了去，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或者达到了个人复仇的目的，分得了一些财物，便以为大功告成，最后陷于失败，不能得到彻底解放。彭湃从一开始开展农民运动就很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驳斥地主、官僚、军阀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污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坚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联合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共同努力，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彻底的、最有光辉前途的农民运动。

(二)

彭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现代农民运动的开拓者，而且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家。他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很丰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他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内容主要是：

(一) 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起着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相勾结，残暴地统治和压榨中国人民。彭湃对于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以大量事实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辛亥革命前，海丰的农民一直在满清皇帝、官僚、地主的阶级压迫之下“呻吟过活”。辛亥革命后，海丰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陈炯明乘机窃据要职，并拉拢扶持一批新官僚。这样，海丰农民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之外，还增加了军阀、官僚政客的残酷压迫剥削。当时的群众形容说：“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陈炯明军阀的军饷从一九二〇年预征到一九三〇年。这些地主兼军阀成为海丰的太上皇。陈炯明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个将军府，由他的六叔和母亲主持，凡行政、司法、教育、税收、军饷、商业等均予操纵。陈炯明同帝国主义勾结，得到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的大力支持，反对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实行封建割据。而帝国主义则假手军阀统治中国人民。陈炯明在海丰的统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缩影。所以，工农商学必须“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使国民革命成功”（第193页）。

彭湃很重视农民和工人在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革命要依靠农民的先行者之一。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便不能取得胜利；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彭湃的伟大，在于党成立不久，他便重视农民运动。早在一九

二二年至二三年，他就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伟大和神圣，谁敢否定！”（第25页）长期以来，农民在地主和军阀象‘虎狼’一样的掠夺之下，生活非常痛苦，必须组织农会，协力团结，进行斗争。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我国农民的状况，认为我国的农民运动有五个“很好的”有利条件和特点，即是：在农民中“佃耕农占大多数”，赤山约的贫农“约占十分之九”；“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在自己的阶级；农民“可以用同盟罢耕”，以至“占领田地”的办法对付地主；由于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农民“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抗的心理”。而且，在农民中“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第11页）他认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我们已很知道了。我们工人应该和农民一样武装起来，做国民革命的工作。”（第100页）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彭湃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担任农民部长时，由他和阮啸仙同志负责起草《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指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因为革命必要最大多数的群众做基础”，才能取得胜利。彭湃同志领导和主持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自然，……城市的工人如果不起来作先锋军，国民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

这个期间彭湃关于农民的历史地位和和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如果同张国焘和陈独秀的观点